

17
湖北文史资料

总第二十七辑

89

北洋军阀统治湖北

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编辑说明

北洋军阀统治中国距今已有六七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熟知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已寥寥无几，搜集这一时期的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也愈来愈困难了。然而，北洋军阀在湖北统治长达14年之久，对湖北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力尽所能地把过去历年征集的有关史料集中核实、整理、编辑出版了这本专辑，以期帮助广大读者了解这段历史。

北洋时期掌握湖北军政大权的主要人物是北洋的段祺瑞、段芝贵、王占元、萧耀南、陈嘉谟。两段执政时间较短，且扎根不深，而萧陈则唯吴佩孚马首是瞻，所以，这本专辑着重收录了王占元、吴佩孚、萧耀南的亲信、幕僚及主要骨干等撰写的第一手资料，采用了以人物为经，事件为纬的编辑方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湖北的种种内幕。由于年代久远，原稿中有一些记忆失误，我们在编辑整理过程中，除了对一般常识性的错误进行了校勘外，尽可能地保持了原稿面貌。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努力做好北洋时期史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欢迎知情者和广大读者多多支持，同时对我们这本专辑提出质疑、订正和补充。

湖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地方史研究室主任湛宗仁为本辑审读了部分稿件，并进行了一些校勘，特此表示感谢。

编者

1989年4月

目 录

北洋军阀统治湖北简述	李天松 (1)
北洋时期湖北的省长更迭及“鄂人治鄂”	卢蔚乾 (17)
北洋军阀在湖北的禁烟黑幕	李树芬 (33)
北洋时期的湖北官矿督办公署	杨 铎 (44)
从爬上督军宝座到自动辞职的王占元	王亚超 (50)
王占元荼毒湖北概略	严 敬 (56)
靖国军在鄂西的活动与鄂西神兵	胡 复 (61)
在鄂西反对北洋军的回忆	蓝文蔚 (72)
中华革命党汉口暴动纪实	鲁祖珍 (81)
湖北兵变之因果	许以栗 (84)
我任王占元炮队营长时经历的兵变情况	颜景宗 (88)
湖北官钱局兵变中罹难目击记	杜锐成 (90)
旅京湖北同乡的倒王运动	饶校文 (94)
海军在兵变和湘鄂战争中	严寿华 (96)
我所经办的王占元财产及纠纷	赵世贤 (102)
王占元的乾义面粉公司	刘秀臣 (118)
“湘军援鄂”吴佩孚渔翁得利	罗世杰 (134)
汉阳兵工厂与曹锟吴佩孚	杨文恺 (137)
萧耀南的起家之术	周克之 (141)
萧耀南夺取省长席位之黑幕	赵蓝田 (148)
萧耀南暴死之谜	华觉明 (151)
粤汉铁路早期工人运动的回忆	马辉之 (153)
“二七”罢工斗争中的武汉工人	陈乃宣 胡云秋 (160)
刘佐龙其人其事	严 敬 (171)

左右逢源善得实惠的刘佐龙·····	许兆龙 (176)
北伐时期北洋军在两湖战场的失败经过·····	刘少泉 (184)
难忘的历程	
——从汀泗桥到武昌城·····	李醒民 (190)
汀泗桥战役溃败经过·····	董 周 (219)
贺胜桥之战随吴佩孚溃退到武昌的回忆·····	蒋雁南 (222)
我在汉口迎接北伐的活动·····	罗良斌 (224)
刘佐龙所部进攻龟山之战·····	王国威 (226)
我所知道的刘玉春·····	任锦堂 (229)
武昌守城战役纪实·····	朱明轩 (234)
围城中见闻·····	陆观澜 (240)

北洋军阀统治湖北简述

李天松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凭借北洋军，迅速地控制了湖北，建立了反动统治。但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和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控制湖北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不断更替。据不精确的统计，从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至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为止的14年中，湖北先后更换了九届督军（或都督、将军、督理、督办）和15届省长（或民政长、巡按使）。尽管这些督军和省长有派系不同的区别，但无不秉承北洋军阀政府的旨意，对湖北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实行野蛮统治。根据北洋军阀统治湖北的过程，北洋军阀在湖北的统治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以及最后覆灭三个部分来叙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的第二天，湖北革命党人建立了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抬出来当上了都督。次年4月，袁世凯依靠北洋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在北京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政权开始建立。袁世凯为了实现军事独裁统治，一上台便立即策划消灭南方革命势力，武力统一全国。作为当时湖北都督的黎元洪立即投靠袁世凯。他多次向袁世凯献策，要袁“消隐患于无形”，提出“军民分治”、“划一官制”、“统一财政”等主张，并向袁保证，他将“率鄂中全体，首先奉行，以蕲统一”。^① 这些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要采取各种措施迅

速地消灭革命势力，以便全国统一于北洋军阀袁世凯。为了取得袁世凯的信赖和消灭革命势力，黎元洪首先在湖北大举裁兵。湖北革命军最多时曾扩大到八个师，两个混成旅，共11万多人。1912年初缩编为五个师，1913年初再缩编为三个师、二个混成旅，曾经是革命党人的官佐，几乎被裁撤殆尽，因此激起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强烈反抗。黎元洪惊恐万状，为了稳固他在鄂的统治，同年4月，黎元洪致电袁世凯，“请其饬李纯派兵一团至汉‘镇慑’”。于是袁即命第六师李纯部‘受副总统节制调遣’，而北洋势力进入湖北之‘大门’遂打开矣”。④当白朗起义军攻入鄂北后，黎元洪更加恐慌，又立即致电袁世凯，请求派兵南下镇压。袁于是命令北洋军王占元、萧耀南两部入鄂，由“是湖北实权，渐渐转入北洋军阀之手”。⑤其次是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血腥镇压。1912年7月，黎元洪以“煽惑军界，假政治改革为名，希图推翻军政、民政两府，破坏各司”的所谓罪名，残杀了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等武昌起义有功人员。8月，黎又借口《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查封了该报，下令逮捕何海鸣、凌六闻。何闻讯逃走，凌被捕遇害。接着，他又与袁世凯勾结杀害了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张、方被杀害后，黎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革命群众。他下令“凡管带以上之军官，皆有杀人权，捉获‘匪党’，即就地正法，不必讯问”，当时的报纸上称之为“亘古未有之杀人法”④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至1913年，黎袁勾结在湖北屠杀参加武昌起义的有功人员达2000多人。⑤三是积极帮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后，又非法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准备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孙中山在袁世凯的逼迫下，被迫发动了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黎元洪在此期间抱定“非袁则乱”的思想，表示“极端拥护项城”，⑥甚至威胁革命党人，说如果因宋案酿成

南北战争，他“必力助袁总统”。同时，对全国舆论谴责袁世凯的宋案、借款问题上也竭力进行辩解，说“刺杀一案，纯系法律问题，……宁可以宋君殉全国，不可以全国殉宋君”，“借款济急，亦固其宜，……即使条件迁就，亦当责议院以丧权，不能罪政府以违法”。⑧革命党人詹大悲等在汉口、武昌召开“国民大会”、“公民大会”、抗议袁世凯“刺宋”、“借款”的罪行，均被黎元洪派兵禁止，并命令警察厅以后遇有对“宋案”主张激烈者、对于“借款”表示反对者以及其他一切意思举动与政府为难者，任何集会结社，一律实行“干涉”，不惜使用“武力”⑨袁世凯准备发动战争，北洋军假道武汉，出兵江西时，黎元洪立即向袁表示说：“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挡住，决无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⑩袁世凯为了使黎元洪卖力地替他镇压革命，也向黎元洪表示说：“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亦不赦。”⑪黎元洪既然敞开了湖北大门，北洋军于是源源不断地开进了湖北。黎元洪对这些开进湖北的北洋军，不仅亲派大员到车站、码头迎接，而且命令汉口镇守使杜锡钧担任北洋军粮台，为之供应军需。这样，湖北便成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兵站和后勤基地。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战争发动后，黎元洪又向袁世凯宣誓：“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及，生死以之，有生之年皆我总统之所赐。”⑫表示全力帮助袁世凯消灭南方革命势力，这时，他不仅把汉阳兵工厂拱手交给袁世凯政权的陆军部接管，为供给北洋军武器装备镇压革命之用，而且还准备派出一师以上的兵力到江西作战，派两个旅的兵力驻扎在江西接壤的阳新、通山、通城等地，准备围剿反袁革命军。

袁世凯勾结黎元洪镇压“二次革命”之后，把北洋军阀统治扩展到了南方各省。10月初，袁世凯又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也被选为正式副总统。随后，黎又支持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解散省议会，破坏《临时约法》代之以袁记

约法，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完全被否定，中国仍然回到了军阀官僚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

袁世凯的军事专制独裁统治建立后，对手握兵权，又占有大好地盘的黎元洪并不放心，于是采用过去清朝对他的办法，先加以笼络，亲笔手书“民国柱石”的匾额，派专使送到武昌赠给黎元洪，表彰他帮助镇压“二次革命”，血腥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功绩”。接着采用“霸王请客”的办法，请他到北京做堂堂正正的副总统，实际上就是要他交出湖北这块地盘给北洋军阀。1913年12月8日，袁世凯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到武昌迎黎北上。9日，黎元洪离鄂，还未到京，袁世凯就任命段祺瑞为湖北代理都督。从此，湖北直接为北洋军阀所统治。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不能久留湖北。1914年2月1日，袁世凯令段祺瑞回京供职，任段芝贵署理湖北都督，这就是湖北近代史上两段督鄂的时期。

两段督鄂期间，他们秉承袁世凯的旨意，首先大批的安插自己的亲信，排斥异己力量。辛亥革命后不久，湖北首先实行军民分治，设有民政长（相当省长），先后由湖北籍的刘心源、夏寿康、饶汉祥担任，两段督鄂后，即先后换成安徽人吕调元、段书云。段祺瑞一到湖北就“安插亲信十余人在府办公”、“自民政长至观察使，均须更换”。^⑫这样，湖北的军政大权均为外省人所掌握。段芝贵督鄂后，又“藉名减政，剔除鄂督官吏，易以徽人，约法会议，亦指徽人为鄂省代议士”，^⑬鄂人怨声载道，极为不满。湖北一些军政要员调到北京后，成立了旅京同乡会，经常插手湖北地方政事，主张鄂人治鄂，与湖北当局常常发生意见分歧。其次为了巩固他们在湖北的统治，极力削弱湖北的军事力量。黎元洪任湖北都督后，多次裁撤湖北军队，但到他离鄂时仍留下了三师两混成旅的兵力，这对北洋军阀的统治仍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段祺瑞督鄂后，就“将湖北的第一、二、三师及江南

留鄂第一师合并，汰弱留强，编为二师。其余第七、八两独立旅及都督府各机关之护卫、巡缉一切零星队伍不在部章所列者，亦并编为警备队，营制饷章似前清巡防队，归民政部统辖，拟保卫地方。”^⑭段芝贵督鄂后，更是“任意横行，湖北三师之众，更并为一师”，^⑮使湖北原来招募的军队所剩无几。与此同时，两段为了强化对湖北的统治，调进大批北洋军。仅汉口、武昌就驻有北洋第二师、北洋第六师、奉天第二十师、江南第一师等，此外，汉口、刘家庙、宜昌、荆州、蕲春、孝感、武穴、田家镇等重要军事要地无不有北洋军驻扎。这些北洋军到湖北后，“风纪荡然，肆行奸淫劫掠”，^⑯无所不为，湖北人民深受其害。第三，两段凭借北洋武力，对湖北革命党人继续进行残酷的迫害。当白朗起义军还在河南活动时，湖北就有不少受黎元洪、段祺瑞等打击迫害的革命党人，跑到河南参与活动。白朗起义军进入湖北后，在湖北各地建立过不少秘密据点，又有不少革命党人与之建立联系，准备进攻武汉，推翻北洋军阀在湖北的地方政权。但由于组织不严密，不少秘密据点被湖北当局所搜获，不少革命党人被捕遇害。1914年4月，段芝贵在汉口捕获所谓“乱党”三四十人。6月，被段杀害了龙尚楷、胡汉亭等10余人。

为了瓦解和安抚武昌首义有功的革命党人，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段芝贵等在杀不胜杀，杀又不绝的情况下，又采用虚尊、虚宠的手段，把首义将领调往北京，授以高衔、高勋、高禄，委以各种虚职，控制起来。这对削弱湖北的革命力量，巩固北洋军阀在湖北的统治也起过重要作用。

由于两段督鄂时期，大量安插亲信，排斥异己，裁撤鄂军，残酷镇压进步势力，引起了湖北各界人民的普遍不满。而当时驻鄂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自1913年4月帮办湖北军务以来，为了收买人心，则“谦冲自抑，故示以和蔼可亲之貌，军队纪律，所以文明。”^⑰因此获得湖北人民一时的普遍好感。1915年8月22

日，袁世凯将段芝贵调任奉天将军，任命张锡奎为镇安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张锡奎未到任前，任命王占元督理湖北军务。但这时王占元极力反对张锡奎入鄂，袁只好取消成命。10月，袁任命王为壮威将军；1916年1月，正式任命王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王占元属直系军阀人物，从此，湖北长期为直系军阀所统治。但在袁世凯未死以前，王占元在湖北的一切活动，都是为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服务的。

二

袁世凯死后，湖北一直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根据直系在湖北统治者的更迭，可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即王占元统治时期（1916年1月至1921年8月），萧耀南统治时期（1921年8月至1926年2月，但这个时期，吴佩孚是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吴所控制），陈嘉谟统治时期（1926年2月至1926年10月，这一时期，吴佩孚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陈嘉谟完全为吴摆布）。这些直系军阀控制湖北之后，都极力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统治。

（一）政治上，直系军阀统治湖北时期，实行的是督军政治，军民两政都以督军为中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统治全国。北洋军阀分裂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王占元倾向于直系，依附于冯国璋。但王占元对黎元洪、段祺瑞也虚尊拉拢。黎元洪继任总统后，1916年7月6日，即下令改各省督理军务长官为督军，巡按使为省长时，即任命王占元为湖北督军，范守佑为省长。7月25日，范守佑死后，王占元又兼任省长，湖北军民两政完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1918年10月18日王辞去省长职务后，又推荐他自己的参谋长何佩瑢为省长。何虽为省长，但何的一举一动对王无不唯马首是瞻，即使如此，王占元对何仍不放心，于是又派自己的另一亲信金世和为省长公署秘

书长，对何进行严密监视，凡重要公事，都要到督军署办理，“省长公署职员，只知有督军，不知有省长。”^⑬何不久投靠皖系，为王占元所不满，强迫其辞职。王于1920年8月又推荐他的亲家、山东人孙振家为湖北省长。同年9月，北京政府根据王占元的推荐，任命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的命令发表后，遭到了湖北民众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不得不于11月改任湖北人、平政院长夏寿泉为湖北省长。夏到湖北后，王派兵包围夏的行署，进行武力威胁，最后将夏撵走。1921年3月北京政府免去夏的省长，由刘承恩继任。萧耀南督鄂时，北京政府曾命叶兰彬为江汉关监督，由于萧的反对，不能视事。1922年黎元洪重任总统后，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分别任命了近10位省长。期望能把省权从督军手中夺过来。同年7月6日，黎元洪下令免去刘承恩湖北省长职务，命汤芑铭继任。曹锟、吴佩孚闻讯后，立即出面干涉，并推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而使汤芑铭不能赴任。王占元、萧耀南不仅牢牢地控制着省政权不放，而且派出大批亲信和爪牙把持湖北各县政权。这些直系军阀掌握整个湖北军政大权后，不但对革命进步人士进行残酷迫害，而且对湖北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也实行血腥镇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董必武、李汉俊等人在湖北地区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主张，积极组织工人运动，发动农民斗争，这些活动有碍军阀的反动统治，于是他们极力进行破坏。1923年中国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湖北省党部筹备处成立后，湖北国共两党开始联合活动，直系军阀对此十分恐慌。1924年5月，萧耀南派出大批军警无理搜查汉口中央地委机关，逮捕了许白昊、刘伯垂等7人，同时通缉林育南、李汉俊、李书渠等。与此同时，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机关也遭了到破坏。1925年6月，萧耀南又以“赤党”罪名，将汉口人道医院院长萧英、潘义等八人杀害，接着又下令通缉共产党员许鸿、王仲友等，妄图消灭革命势力，巩固直系军阀在湖北的统治。

直系军阀为了扑灭湖北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其中最大的惨案就有三起，即1919年的“六一惨案”、1923年的“二七惨案”、1925年的“六一一惨案”，许多无辜的工人、学生被军阀枪杀，逮捕。仅“二七惨案”中，工人被惨杀就有44人，伤300多人，被捕60余人，被迫外逃或随后被开除的千余人。但反动派的凶恶残忍，并没有吓倒湖北人民，而是更加激起了湖北人民的反抗。

直系军阀为了维持他们在湖北的反动统治，于是进一步加强与帝国主义勾结，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镇压人民的反抗。王占元督鄂时期，就公开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1919年5月，正当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贼进入高潮的时候，他与日本的来往更为密切。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的第二天，日本驻汉派遣正副司令赴督署拜见王占元，王设宴款待。5月12日，王亲自主持召开全省军政联席会议，要求文武官员“切实保护侨胞，训谕商民勿生激烈举动”，^①日本政府当时极力拉拢王占元，将“日皇之一二三等勋章于此时送给王占元、何佩瑒及汉口镇守使杜锡钧等三人”。^②王占元在代为主持大总统徐世昌就职授予鄂省官员勋章时，也给日本驻汉领事授了嘉禾章。王与何佩瑒等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武汉之日人不受危险”。从王占元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看，已完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吴佩孚、萧耀南统治湖北期间也仍然是对外国侵略采取保护政策，1924年4月，日本水雷舰队在黄石附近撞沉小划一只，淹毙10余人。同年6月，日商浅田一二洋行殴打中国人，致使三人受伤，引起市民公愤，将洋行团团围困，要求严惩凶手。这时湖北当局不是向外国侵略者提出严重抗议，进行交涉，而是命令汉口警察厅派出大批武装军警保护洋行，驱赶群众，逮捕市民，以讨好外国侵略者。

（二）军事上，主要是紧紧掌握军权，依靠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支持不断扩充军队，扩大地盘，实行军事独裁统治。

王占元督鄂后，仍兼第二师师长，并凭借这支反动武装控制全省军政大权，镇压人民的反抗，消灭进步势力。王占元常吹嘘说：“予二师军队一名，可抵猛虎一只，湖北地方自安，非予其谁有此能力耶。”^②并且不断地“改编军队，扩充兵力”。1920年6月，王任两湖巡阅使后，又乘直皖战争之机，将皖系军阀、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的部队缴械、改编，进一步扩大了实力。由于王占元手握重兵，实力不断增强，才得以督鄂达七年之久。萧耀南督鄂时也是紧紧抓住自己的第二十五师死死不放，并以这支武装为基础，不断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湖北其他部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1925年他又趁长江流域亲吴（佩孚）将领拥吴东山再起之机，先后成立了第九师和鄂军第一师，数月之间，湖北军队增加了数万人。萧死后，陈嘉谟继任督办湖北军务。这位直系在鄂的最后统治者，尽管在位的时间不长，但也跟他的前任一样，拚命增强军事实力，将第二十五师由原来的1.25万人扩大为1.5万人外，又新编了陆军第十七和二十一混成旅。

这些军阀能迅速地扩充军队，增强实力，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美国就为直系军阀运送了大量的军火武器，并帮助两湖巡阅使吴佩孚组织和训练飞行队。1923年美国又供给直系价值300万美元的弹药和武器，接着又由美国公使斡旋，使吴佩孚从一个美国商人那里获得了1万支步枪，2000万发子弹和250挺机枪。英国也为吴佩孚提供了大批德式步枪。萧耀南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弄到了大批武器弹药，正因为直系军阀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得到了大批军火武器，才有可能使他们扩充军队，增强实力。

这些军阀实力增强以后，一方面镇压人民的反抗，消灭进步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就是扩大地盘，实行军事独裁统治。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旧国会和旧约法，孙中山在1917年领导和发动了护法运动，立即得到全国

各地的响应，不少地区纷纷宣布独立或自主，学中山建立护法军政府后，即派军政府洛议颉回鄂运动军队起义护法。同年12月，襄阳镇守使、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与荆州镇守使、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响应孙中山护法的号召，分别率部宣布脱离北洋军阀政府而自主，并致电孙中山，决心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荆襄宣布自主后，黎天才、石星川分别将所部军队改为湖北靖国军第一、第二军，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联合已宣布自主的随县、枣阳、黄州等自主力量，公推黎天才为湖北靖国军总司令。在沙市设立办公处，负责对外联络，扩充军队，正式成立两个师的自主军。并在荆、襄两地设立财政局，没收北洋政府官绅局和银行的财产，向豪绅、富户征收军费等等。

王占元得知荆襄自主后，立即派出反动武装分兵三路向自主军进攻。同年12月21日，王占元接到北洋政府讨伐黎天才的命令后，即任北洋军第一师师长李奎元为讨伐军总司令，指挥各路军队向自主军进攻。最初，荆襄自主军转战于鄂西、川东、豫南和湘西，声势浩大，先后攻克宜昌、京山、钟祥、监利、天门、新野、南阳、万县等重要城镇。但到1918年初，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于自主军，北洋政府调动了豫、皖、陕三省的兵力，对自主军进行围攻。自主军寡不敌众，很快失败。

王占元在打败荆襄自主的进步军事力量之后，气焰更为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民主革命势力，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王占元的反动行径，激起了湖北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一致要求“驱逐王占元”。恰值1920年直皖战争后，西南各省发起联省自治运动，自治之风很快地影响到湖北。由于湖北人民早已对王占元的统治愤恨不满，借此很快地形成了强大的“驱王自治运动”。尽管湖北人士在当时驱王自治问题上，内部出现了分歧，但用武力驱王之后，实行“鄂人治鄂”，基本看法是一致的。而要武力驱王，就必须要有武装力量，当时湖北的军队基

本上属北洋系，不能依靠，因此，只得向邻省借用武装力量。于是以蒋作宾、孔庚、李书城为首的一批军政界民主人士就去联络湖南督军赵恒惕和四川督军刘湘，借用湘、川武力以驱王，推进湖北的自治运动。前四川都督熊克武也秘密到湖南接洽两省共同出兵援鄂，在武汉建立联省自治政府。这样湘川鄂三方很快达成驱王协议，决定川湘各出五个混成旅帮助鄂人“自治”。

1921年7月22日，在湘的湖北人士在湘、川督军的支持下，便在长沙组成湖北自治政府和自治军，推举蒋作宾为自治政府总监、孔庚为省政务院长、刘孝忱为秘书长、施洋、卢复、彭伯勋为秘书，驻长沙的鄂军团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准备率军回鄂驱王。

7月16日，由湘军组成的“援鄂自治军”，举行宣誓大会，正式出兵“援鄂”，援鄂战争爆发。湘军出师后，进展非常顺利，迅速地攻占了湖北的羊楼司、通城、蒲圻等地。

王占元面对湘军的大举进攻，一面调动兵力前往堵截，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和直系头目曹錕、吴佩孚，要求速援。直皖战争后，曹錕、吴佩孚侵吞地盘野心更大，湖北早就为他们所垂涎，只是恨无机会从王占元手中夺取到手。曹、吴接王占元求援电后，立即委任萧耀南为直军援鄂总司令，出兵“援鄂”，但他们的宗旨是援鄂不援王。萧耀南率所部第二十五师于7月31日抵达武汉。王占元因战事吃紧，立即请萧率直军参战，萧却借口部队尚未集中完毕，不肯参战。8月6日，王占元接到前方连续失败的消息，始知萧耀南并非真心援鄂，于是以衰病为名宣布辞职。8月9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王占元本兼各职，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8月11日，王占元离开武汉，萧耀南接印视事。吴佩孚也来鄂率直军进攻湘军，湘军大败。9月1日，湘直两军签订了停战协定。湘军援鄂失败后，湖北自治政府和自治军也随之瓦解。川军没有与湘军同时发动战

争，只是在湘军即将失败时，才向湖北进攻。9月6日进攻宜昌，也被吴佩孚指挥的直军打败。10月11日，川军退出鄂境，后川直两军也订立了停战协定，至此援鄂战争结束。在这场战争中获利最大的是曹錕、吴佩孚、萧耀南等一批新直系军阀。从此，开始了吴佩孚、萧耀南统治湖北的时期。

（三）经济上对湖北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湖北是北洋军阀军费的重要供给地，也是大小军阀搜刮钱财、填饱私囊的重要地盘。1921年9月至1922年12月一年多时间里，吴佩孚利用湘鄂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之机，向湖北官钱局强行提取了四次巨额款项，折合银元543.89余万元。当时就有人指出湖北省财政厅为“北洋军阀的帐房”。萧耀南督鄂时，军费占湖北财政支出的94%以上。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使湖北财政发生了严重危机，“照六年（1917）决算，收入与支出相抵，不敷至250万元之多”，湖北财政入不敷出，致使“所有实业、教育、行政、司法各业皆停顿。”^②但军阀为了搜刮军费，填饱私囊，仍然不顾人民死活，采取各种手段对湖北人民进行榨取。

1、强行摊派公债。北洋政府从1912年至1926年发行公债共有6.12多亿元，由各省分摊。王占元督鄂时发行的地方公债有200万元，“到期本利不还”。^③1925年萧耀南发行金库券340万元，“通令各县知事强要农民捐纳”。^④同年2月，萧又以鄂省财政厅名义，赶制省库券240万元强迫汉口各商业团体以及各县商业团体认募。

2、滥发纸币。1921年9月，吴佩孚、萧耀南以军需费急需为由，勒令湖北官钱局加印官票500万串。^⑤1925年他们又发行“官印官票”500万张，次年又发行“军需汇兑券”3000万元，由于滥发纸币，导致货币不断贬值，金融大起恐慌。1925年至1926年，一张官票由换钱一串数十文跌至折半。发行“军需汇兑券”时，省政府将官钱局作为票本的固定资产押给外国银行，官

票信用陡跌，以致“无人要”，“农民因存留官票而死的，非常之多。”^⑤

3、强征苛捐杂税。捐税是北洋军阀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他们不仅连年不断地提高正式捐税，而且强征苛捐杂税。强征苛捐杂税的办法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旧有名目外附加税收或预征正税；另一个方面是创立新税名目进行勒索。从第一个方面来说，湖北军阀主要是增加田赋附税。田赋包括地丁、漕米、屯餉、租课。1914年开始，每地丁征税银一两或米一石，附增学捐560文。^⑥1915年下半年开始，每银一两加征丁漕附税一二百文至七八百文，最高的达到1800文。1924年萧耀南下令财政厅转飭各县预征正税，限期征解1925、1926两年的地丁税。^⑦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湖北创立的新税名目繁多，如门户捐、牲畜捐、串票捐、税票捐、捐税附加税等，此外还有纸厘、烟厘、结婚贴印花等，这些无奇不有的苛捐杂税名目不下数十种，但最后都以各种不同的途径转移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

4、裁卖鸦片。这是北洋军阀搜刮钱财最恶毒而又最无耻的一种办法。王占元鄂督时，就与西南各省军阀串通一气，贩运鸦片。萧耀南督鄂后大开烟禁，公开征收鸦片税。襄阳镇守使还按所辖县分划分若干区，每区设委员一人，专司征收鸦片税。同时还强迫农民“以种植罂粟为必要义务”，每年每亩烟苗抽税6元，每两烟土税抽3角。湖北烟税年额2000万元，占全年收入的一半。^⑧

北洋军阀在鄂统治期间，由于军阀横征暴敛，使湖北广大人民日益贫困破产，而大小军阀搜刮的钱财之多，“殊足骇人听闻”^⑨王占元在鄂八年，搜刮的钱财共有8000多万。他把这些不义之财，投资近代工业活动获得巨额利润后，即拿出一部分回山东老家购买田地，“成为亘达四县土地”的军阀官僚大地主。王占元在保定、济南、天津、北京、大连分别置有房地产，设有银